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Defensive vs. Offensive Realism

doi:10.30390/ISC.200303_42(2).0001

問題與研究, 42(2), 2003

Issues & Studies, 42(2), 2003

作者/Author：鄭端耀(Tuan Y. Cheng)

頁數/Page：1-2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 理論爭辯之評析

鄭端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於後冷戰時期面臨嚴峻挑戰，國際環境趨向緩和導致現實主義理論遭受強烈質疑，而現實主義內部又產生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兩個學派辯論。由於兩者對無政府狀態性質、權力作用以及外交政策有不同的詮釋，他們對於國家安全、國際合作、權力結構影響力以及政策角色皆有不同的主張。不過，縱然雙方間有許多差異，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只是程度之差，而非種類之別，而且兩派觀點各有其優缺點，如果能截長補短，雙方間其實具有多方面互補功能，對現實主義發展能產生正面助益。此外，只要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建構不至於過度推演發展，兩者的辯論對現實主義理論研究與實務政策取向，皆能增添探索與選擇的空間。

關鍵詞：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壹、前言

自國際政治學者 Hans Morgenthau 於一九四八年出版國際政治一書，^①強力推廣現實主義 (Realism) 理論以來，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這段期間中，國際關係歷經各種重大變化，而國際關係理論也不斷推陳出新，但是現實主義卻能歷久不衰，一直位居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地位，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將其擊倒，也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取代其主流地位，此種情形在未來可見的時日中可能還會持續。無疑的，像現實主義如此超強獨特的地位，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堪稱是唯一現象，而且該理論也是國

註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際關係中最重要與最具影響力的理論。

事實上，過去五十年中，現實主義是所有國際關係理論中面臨最多挑戰的理論，幾乎所有後起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皆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和打擊的對象，似乎只要能扳倒現實主義，立即可爭得一席之地。而且在歷次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中，不論是方法論還是實質內容的辯論，現實主義理論皆是其中的要角。例如，在方法論辯論上，一九六〇年代傳統學派和行為學派（Traditionalism vs. Behaviorism）的爭辯，以及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Positivism vs. Post-Positivism）的爭辯，現實主義即是傳統學派和實證主義的主要代表者。^②在實質內容辯論上，一九三〇年代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爭論（Realism vs. Idealism），一九七〇年代現實主義和相互依存的爭論（Realism vs. Interdependence），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爭論（Neorealism vs.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一九九〇年代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爭論（Neorealism vs. Constructivism），現實主義皆扮演主要角色。^③

毋庸置疑，現實主義並非靜止不變的理論。實際上，隨著國際環境變遷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現實主義也隨之進行調整與成長。Morgenthau 以人性為出發所詮釋的現實主義，至一九七〇年代因受行為學派方法論的影響，以及意圖建立理論的驅使下，Kenneth Waltz 在一九七九年從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觀點，並結合傳統現實主義有關權力政治的基本主張，建立了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一般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此也是過去二十年影響國際關係理論思維最重要的理論。^④然而，時至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面對冷戰戲劇化的結束，現實主義在事前無法提出適當的解釋與預測，並在事後無法有效呼應國際環境的發展，致使現實主義面臨強大挑戰，除了在外圍遭致眾多國際關係理論的批判，而且在內部也逐漸形成兩派觀點的爭論。其中主張國際關係就是權力鬥爭，國家會不斷的擴張權力追求國家安全的，被稱為是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但主張國際關係不必然是權力鬥爭，國家可藉由外交政策的手段尋求合作，而且防禦是獲取國家安全較有效的方法，此類觀點被稱為是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學派，兩派間相互爭

註② Yosel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1989), pp. 235-25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1988), pp. 376~296; and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③ E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論，持續近十年之久。^⑤基本上，守勢現實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期間略居上風，而攻勢現實主義則從二〇〇〇年後逐漸抬頭。

是故，現實主義發展至今，早非原先單一理論的架構，而是已發展成爲現實主義理論的族群，目前在這族群下至少包括五個相關學派，亦即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al Realism)，Waltz 的新現實主義，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以及強調外交政策行爲角色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⑥這些學派間有著共同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主張，但是在層次分析、權力運作、政策影響力和決策者角色等問題則互有觀點差異，各有不同的解析與強調重點。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和分析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辯論，其中的主要理由有三點：一、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間的辯論是現實主義內部至今極具代表性的理論爭辯，此對現實主義理論的詮釋、發展和應用，將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基於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影響地位，應當對此給予關切與瞭解。二、兩者間的理論爭辯涉及相當大程度的政策歧異，姑且不論辯論結果如何，以及可能對實際決策思維的影響，僅是從不同學派角度去考量決策制定與施行，都會對一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產生實質差異與影響，實有必要加以釐清，並比較其中的利害關係。三、兩者間的理論爭辯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之內反映國際環境的變化。近來自美國布希政府上台，其所採取的強勢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加深一般對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視，本文目的雖非探討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此階段，似有必要對該理論的主張做較深入瞭解，以便有助於觀察與掌握國際政治變化的脈絡與可能影響。

本文擬先就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主張提出綜合性說明，此部分是現實主義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所有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共識，也是被泛稱爲現實主義理論的依據。接著則將對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與主張，進行個別探討與解析，其中關切重點主要在無政府狀態詮釋、層次分析、國家政策角色、和國際策略等問題。再接著，擬對兩者之間的差異從事比較分析，從中分辨兩者的差異性質與程度，同時試圖探索兩者間的共通性，亦即雙方共容、共同的空間有多少，以及該次辯論對現實主義和國際關係理論有何重大意義與作用。不過，在此須說明的是，本文將不擬對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多做說明，其中原因很明顯，此乃因一般對此已相當熟悉，勿須贅言，除非文中特別涉及，而需要補充，否則沒有必要再申論之。至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由於此非本文探討目的，而且限於篇幅，故不擬包含在本文範圍之內，須要另文專論，但因守勢現實主義在某種程度之內，是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相通的，因此在論及守勢現實主義時，會略作連帶說明。

註⑤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註⑥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貳、現實主義理論基本主張

每一個理論皆有基本假設和內在邏輯，這是作為理論的根本要件，如果假設愈具有概括性和解釋能力，並能獲得經驗性的證明，則愈具有一般陳述的效力，同時如果假設與假設之間具有嚴謹的因果關係和相互一致性，則該理論將被視為強勢或優質的理論，否則則相反之。

對一個枝葉茂盛的巨型現實主義理論言，基本假設的重要性顯得更為突出與不可或缺。現實主義今日已發展成為理論族群，在這眾多延伸而出的理論旁枝中，能有效維繫他們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就是主幹的基本假設主張。如果能對基本假設愈具有共識性，他們的凝聚力會愈強，理論的延伸或擴展將更有助於理論茁壯與發展，相互間的觀點爭論可發揮正面的成長帶動效應。相對的，如果對基本假設呈現模糊化，或形成質疑與爭議，則凝聚力趨向弱化，或甚至造成內部分裂，而陷理論於危機中。

是故，一則為了探討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主張的需求，一則是為了剖析現實主義理論發展的趨勢，實有必要在此先釐清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主張，然後再以此為基礎來探討相關問題。

綜合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可歸納成下列六個重點：

一、國家是國際社會主要成員—此點應是現實主義最基本與最不具爭議的主張，所有現實主義學者都接受此論點。國家不只是當前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在過去數百年間和未來可見歲月都是如此。而且由於國家是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其它如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或團體，均不被視為主要成員，他們在國際社會的活動能力與範圍，都受國家規定與節制。^⑦從此角度觀之，國家其實是現實主義者眼中唯一的國際社會主要成員，這也是一般稱現實主義為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論的主因。

二、國家是理性單一的實體—現實主義並不關切國家的政體性質，是否屬於民主、威權或其它，也不關切國內政治運作，是否執政者屬於多數還是少數政府，它只關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與行為，而且從此觀點切入，現實主義以為所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本質與行為皆是相同的。亦即所有國家對外行為皆屬理性，它會本著成本效益和利害關係，評估國際環境情勢，設定國家企求的目標，以及追求目標的方法與策略，而且不只是注意眼前的行為結果，同時關切中、長程發展。另外，國家對外行為屬於國家利益與整體意志的展現，不論內部情況如何，決策者思維皆會將國家利益超越國

註⑦ Waltz 表示非國家成員在國際社會可能會有相當大的活動空間，但是這些空間範圍都是得之於國家正式或默示的許可，見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4。另一位現實主義代表性的學者 Stephen Krasner 也表示其它非國家成員在國際社會的行為範圍，是由國家權力與決策所規定，見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8.

內政治之上，在對外行動上顯現國家是單一實體（Unitary Entity）的特質。^⑧

三、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現實主義者表示無政府狀態（Anarchy）並非是負面的涵義，也非意指國際社會處於無秩序或紊亂狀態，更不是國際社會經常在衝突和戰爭狀態，它只是刻劃出國際社會環境的特色，在國家與國家相互共處的環境中，沒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位居國家之上。^⑨由於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國家將面臨來自其它國家的安全威脅，此威脅並非一定是立即的，或未來必然會發生的，但是它總存在著可能性，因此不得不有所準備與防備。而且由於是無政府狀態，國家必須尋求自力更生，依賴自己的力量來保障自我的安全與福祉，所以 Waltz 強調「自助必然是無政府秩序中行動的原則」。^⑩

四、國家企求的目標是相同的而且相互衝突—現實主義者有些強調國家以追求安全為目標，有些強調以追求權力為目標，同時現實主義者有些認為國家追求權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有些認為追求權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⑪不論兩者當中有其不同的強調，事實上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求取生存，此對所有國家皆是相同，惟有確保國家生存後才能從事其它國際活動，而且不論是追求安全或權力，其目的也是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然而，當所有國家都為求取生存而追求安全為目標時，一國增加安全的行動，卻構成另一國的安全威脅，如此相互衝突的效應，形成所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難局。^⑫

五、國家對外影響力主要建立在國家物質能力基礎上一國家對外追求目標與行使影響力，主要是透過威脅或利誘的手段，但是不論是採用威脅或利誘，它都決定在國家能力基礎上。基本上，一般將國家能力分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兩類，有形資源即指物質資源如人口、財富、科技與軍力等，無形資源乃非物質資源如民心士氣、外交素質與領導能力等。雖然現實主義者在看待國家能力問題時，並未排除非物質資源的因素，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強調物質資源的重要性，而這其中又以軍事力量最為重要。因此，誰能擁有愈多物質資源的國家，愈能在國際社會成為強權，愈能行使較多影響力，這也是現實主義者常常掛在口中的話語，「強者可為所欲為、而弱者須承受苦難。」^⑬

註⑧ Grieco 曾對該點有所闡述，見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65~166.

註⑨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9~10.

註⑩ "Self-help is necessarily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in an anarchic order," 見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1.

註⑪ 有關兩者之間的爭議與差別，在相當程度上顯現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不同看法，詳細的內容將在本文下一節申論。

註⑫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註⑬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有關現實主義對國家物質資源重要性的主張，可參閱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16~18.

六、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絕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接受，^⑭權力分配是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行為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權力分配會形成不同權力結構型態，如單極、兩極、三極或多極化，此將直接影響國際關係運作，在不同結構型態下的國際關係，會有不同遊戲規則，進而約制各國的國際行為。其次，各國在國際權力結構所處的位置，將會決定各國在國際關係的角色與地位，強權扮演著主導性角色，弱國則須順應與屈服。雖然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但是國際權力分配卻建立起一個無形的國際層級架構，各國依強弱大小排列有序，各在自己位置上扮演適當的角色，如果發生偏離現象時，會遭致懲罰而付出重大代價。至於當權力分配發生變化時，國際關係運作與各國角色都會隨之變化而進行調整。無疑的，此處的說明可以體認，為何現實主義者總是強調權力「相對性」的重要，各國不只關切本身權力利益的獲取，同時注意其它國家利益的獲取，因為權力惟有透過權力分配的相對性，才顯現其實際的政治意義。^⑮

叁、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主張

前言曾提及，冷戰結束後的十年期間，對現實主義而言是很大的挑戰。由於國際局勢趨向緩和，使得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呈現相對弱勢，同時原本強調「非權力政治」因素，位居國際關係非主流地位的學派，如認知理論（Cognition Theory）、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卻紛紛興起，大有取代現實主義的姿態。^⑯在此衝擊影響下，許多現實主義學者也開始轉變論調，表示權力鬥爭並非必然的現象，國際合作存在發展空間，而且對國際關係持樂觀態度，此種較具溫和與妥協色彩的立場，形成後來所謂守勢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要觀點。

然而，在這段期間中，卻有若干現實主義者，不但未因後冷戰國際環境改變而肯稍作調整與讓步，反而在既定立場上堅持現實主義的主張，並不時的加以闡述與宣揚，^⑰

註⑭ 大致上，除了古典現實主義者是從國家和人性層次探討國際權力運作，未特別強調國際體系層次外，其餘現實主義者皆同意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主導性。不過，雖然古典現實主義並未討論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但是卻強調國際社會權力平衡運作，因此在本質上古典現實主義者當也會接受該主張。

註⑮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bid., pp. 116~42.

註⑯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第15卷第2期（民國90年夏季號），頁199~229。

註⑰ 攻勢現實主義代表性學者包括 Mearsheimer, Labs, Zakaria, 和 Schweller 等，這其中以 Mearsheimer 最具代表性，在這段期間，他不只提出多篇眾所矚目的論文，而且在理論的詮釋上也構成較完整的系統。是故，本節有關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申論，將以 Mearsheimer 為主，其它的則在相關討論的論點中從旁補充之。可參閱文獻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and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這其中尤以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 John J. Mearsheimer 的表現最為突出耀眼，他完全不顧當時學風轉向，毅然而然的堅持己見，從一九九〇年起連續發表若干篇頗具爭議與批判性的論文，^⑩一方面凸顯後冷戰現實主義的國際觀，一方面嚴厲駁斥當下國際理論的錯誤，曾引發許多議論。此外，Mearsheimer 還更進一步結合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論與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鬥爭主張，形成極具侵略性和衝突性的攻勢現實主義面貌，把現實主義的國際權力鬥爭觀點發揮的淋漓盡致。這些論點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強權政治的悲劇」中有詳細精彩的論述，而該書也可稱是當前最具攻勢現實主義觀點的代表作。^⑪本節接下來即針對該書內容與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作一申論與分析。

雖然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有其共同的理論基本主張，但是由於這些基本主張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空間，再加上不同學派有不同強調重點與詮釋角度，則衍生出相當不同面貌的國際觀，一者強調國際攻勢動態作為，一者顯示國際環境守勢特質。

基本上，攻勢現實主義承續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決定論的觀點，亦即國際體系層次是影響國家對外行為最重要的因素，其它的層次如國家和決策者，雖也具有若干程度的影響作用，但是無法和國際層次相提並論，最多僅是次要因素。國際層次有兩項重要因素—無政府狀態和權力分配，無政府狀態構成國際環境的特色，權力分配構成國際體系結構，此兩者交互作用，決定國際關係運作與國際行為。

攻勢現實主義者以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會相互害怕，擔憂危險、外患和戰爭的可能性，雖然害怕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將因時、地和國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通常是害怕程度與國家權力大小、地緣政治環境和國際權力分配有直接關係，相互害怕愈厲害時，權力鬥爭也愈激烈，相互擔憂趨緩時，權力角逐亦會緩和，但是總無法減低到勿須擔憂的程度。^⑫同時，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無法知悉對方意圖，此非單純的溝通問題，國家間實際上存在許多溝通管道，但是卻無法因此而能知道對方真正意圖，相互間常是爾虞我詐，各有計算，無法信任對方。因此，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求取生存，並無法外求，惟有尋求自助，追求各自利益，建立個別能力，而且不只是著重短程獲利，並從中長程利益進行考量，Mearsheimer 還引用「天助自助」說詞，來強調自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⑬

在國際社會自助體系下，國家求取生存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權力，此既是國家的目標也是手段。一般而言，攻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國家追求權力呈現幾項特色：一、

註^⑩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Disorder Restored," in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ed.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N.Y.: W.W. Norton & Company, 1992), pp. 213~237;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49.

註^⑪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註^⑫ *Ibid.*, pp. 32~33 & 42~43.

註^⑬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Ibid.*, p. 33.

權力增加是沒有限度的，會一直不斷進行，直到成為國際霸權為止。然而，因為國際社會並不存在全球性霸權，最多只是區域性霸權，例如美國是美洲地區的霸權，也是當今唯一的區域霸權，故實質上國際社會的權力競逐與鬥爭永不終止。^②二、權力增加沒有限度是因為國家無法知道須擁有多少權力才是安全，從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答案，只能不斷的向前推進，而且國家不只是關心眼前的安全，它還須預謀未來的安全與發展，而此將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三、權力增加是以相對權力增加為目的，設法提升在國際權力分配所占的比例，使己方處於相對的有利地位，同時國家也會設法阻止他國增加權力，特別是防止權力分配發生變化，置己方於不利的地位中。四、國際社會不存在現狀滿足國家，此因為現狀永不確定，無法滿足於國家需求，國家只有不斷的尋求各種方法與手段增加權力，讓己方處於有利地位。^③

然而，攻勢現實主義者強調，雖然國家擴權是本著積極攻勢的作為，但絕不至於盲目與衝動。攻勢現實主義者與其他現實主義者相同，也都接受國家是理性成員的基本主張，認為國家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會經過審慎評估，仔細衡量成本效益，謀定而後動。基本上，在這過程中，有幾項要點值得注意：一、國家能力是決定對外擴權的重要因素，亦即當國家力量強大時，會較傾向擴張。同時還有相關學者指出，國家力量增強尚不足以構成擴權充份條件，還須要政府執政能力的增強相互配合，才較可能從事對外擴張行動。^④二、國家擴權須見機行事、伺機而動。擴權本身乃不易之舉，隨時受周邊國家警戒與注意，正面行動容易引起反彈與衝突，常須伺機而動，尋求有利的時機，而且即使機會來臨，不論是自我製造的或是國際環境形成的，並不表示可貿然行動，須謹慎評估合理代價，以及可能產生結果，如果代價太高，縱然有機可乘，可能仍會按兵不動。三、國家擴權以增加財富、壯大軍力、獲取核武、和成就霸權為目標，因該些目標與國家安全和國際權力分配最直接相關，同時國家會採取各種可運用的手段與策略，包括利誘、威脅、消耗、替代、姑息、制衡和戰爭等，來追求目標應付對手國家。^⑤四、國家增權向外擴張是有其風險性，對外行動有時成功，但有時也失敗，進退之間的決策評估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有時也會發生誤判情形，例如，國家能力多少並非決定戰爭的唯一標準，其它如情報訊息是否可靠、民心士氣能否維繫，以及戰略戰術運用是否得宜，皆會影響實際的結果。因此，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者，在進退之間拿捏的判斷與智慧是很重要的。^⑥

註② Mearsheimer所指的霸權是屬於「唯一」的涵義，亦即在國際政治或區域政治中是唯一的強權，而非比較強大的強權，是一種全面壓倒性的勝利。因此，在這涵義中，國際社會並不存在此唯一的霸權，而且當代只有美國是唯一區域霸權。Ibid., pp. 40~42.

註③ Ibid., pp. 32~36.

註④ 此項論點是同屬攻勢現實主義的學者 Zakaria，根據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外擴張的經驗所提供的主張。見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⑤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bid., chap. 5.

註⑥ Ibid., pp. 37~40.

無政府狀態是造成國家害怕和權力鬥爭原因，但是國際權力鬥爭會及於何種程度？是屬於穩定溫和、激烈衝突，或是爆發戰爭？此問題則不是無政府狀態可以解釋，而須透過國際權力分配提供答案。事實上，權力分配不只會決定國際權力結構，而且會影響國家行爲。依照Mearsheimer的分類，國際權力結構可以分成三種類型—平衡兩極（Balanced Bipolarity）、平衡多極（Balanced Multipolarity）、和不平衡多極（Unbalanced Multipolarity）。^①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爲平衡兩極即是一般所稱的兩極體系，此是國際權力結構中最具穩定性的體系，強權的權力分配較爲平均，容易形成相互制衡局面，而且強權間的捉對衝突概率最小，僅有一對而已，同時因爲只有兩個強權，較不易發生誤判情形，此也將減少相互間害怕與不安，有助於國際關係運作穩定。平衡多極指國際體系存在三個以上的強權，而且強權間的權力沒有重大差距，至少未出現明顯的權力傾斜現象。平衡多極較兩極體系不穩定，而且較易引起國際衝突。隨著強權數目的增加，強權捉對衝突的概率相對增加，而且在多極體系下，國際權力運作空間增大，成員關係變化速度增快，國際權力分配很難達到均衡狀態，相互間的害怕與不安亦相對增高，且較容易發生誤判的現象。不平衡多極是最不穩定、最容易發生國際衝突戰爭的體系，不平衡多極是指在多極體系下，權力分配極不平衡，形成明顯傾斜至一方，而出現潛在霸權的現象。此種情勢發展會造成弱勢強權極度不安全感，亟需改變當前的不利現狀，而採取各種結盟、建軍，與發展武器等手段。相對的，潛在霸權在面對其它強權深具敵意的行動下，亦感害怕與不安，以爲須採必要的對應行動，同時由於國家能力日益茁壯，加深其對外擴權與行動的必要。換言之，不平衡多極具有切平衡多極體系的不穩定因素，同時還多添權力分配不平衡的負面因素。^②

以上是有關攻勢現實主義的主要重點，攻勢現實主義者以爲該理論不只是描述與解釋國際關係的強權政治，而且還能提出預測，並提供政策建言，同時國際關係的大事、變化發展與主要現象，攻勢現實主義都能提供有力解釋，該理論毫無疑問是國際關係最強勢的理論。然而，攻勢現實主義者如Mearsheimer也承認該理論含有若干缺失：一、攻勢現實主義只能解釋大部份現象，而非全部，亦即存在反證的問題。Mearsheimer認爲該問題雖是缺失，但不算嚴重，因爲反證的案例很少，不影響該理論的合理性。^③二、攻勢現實主義完全從國際體系解釋國際關係，是典型的國際體系理論，它不關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的變數，視爲黑盒子作業看待，而且也因爲如此的緣故，它無法解釋某些現象，或甚至出現反證問題。Mearsheimer認爲這是攻勢現實主義需要付的代價，理論都須將現實簡化，而且無法全面涵蓋，只能選擇最重要包含其中。三、攻勢現實主義屬於國際關係總體層次（Macro-Level）理論，較能有效詮釋國際整體運作與發展，但是對個別現象與問題，有時則無法提供答案，形成「無決定性」（Indeterminate）情況。Mearsheimer表示此種情形對總體理論言是正常的，

註① 實際而言，應該有四種類型，須添加不平衡兩極（Unbalanced Bipolarity），但是該類型的國際結構很難持續存在，因此不列入討論。Ibid., p. 337.

註② Ibid., chap. 9, pp. 334~359.

註③ Ibid., p. 10.

可以借助其它比較細膩的中階理論 (Middle-Ranged Theory) 如嚇阻理論加以補充，可達到相互增強效果。^⑩

無論如何，攻勢現實主義者主要關切國際強權政治，此並不表示不關心其它國家的對外關係，主要是強權政治最足以決定國際關係的運作與發展，所有國際成員皆受其直接影響，因此應給予較多注意。但是攻勢現實主義者卻對強權政治抱持悲觀態度，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強權注定相互害怕與不斷權力鬥爭，此確屬國際悲劇，但是卻無法逃避。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為面對此國際關係的現實，比較正面與建設性的做法，應是坦然接受與適應學習，而且唯有如此才有助於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行為與角色。^⑪

肆、守勢現實主義理論主張

守勢現實主義理論起源於 Robert Jervis 在一九七八年的一篇論文，在該篇論文中，Jervis 將軍事能力區分為攻勢與守勢兩類，並以為此分類可以解決國際關係「安全困境」問題。^⑫一九八〇年代國際關係學者持續展開有關攻勢與守勢的研究，分從概念、測量、策略與歷史經驗探討該分類與國際安全的關係，並且從事建立攻守理論 (Offense-Defense Theory) 的工作。^⑬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環境改變的衝擊，若干現實主義學者將新現實主義的主張結合攻守理論的觀點，形成較具彈性與溫和色彩的守勢現實主義，該名稱首次出現在一九九一年 Jack Snyder 的「帝國神話」一書中，^⑭由於表達得相當傳神，此後普遍為學界所接受，並從而展開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間的辯論，至今仍在持續中。

註⑩ Ibid., pp. 8~12.

註⑪ Ibid., pp. xi~xii & 17~18.

註⑫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註⑬ 該工作一直持續至一九九〇年代以及目前。相關的代表性著作如下 Jack S. Lev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in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June 1984), pp. 219~238; Scot D. Sagan,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2 (Fall 1986), pp. 151~176; Ted Hopf,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June 1991), pp. 475~494;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1 (Summer 1995), pp. 660~691;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5~43; and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44~82.

註⑭ 「侵略現實主義」 (Aggressive Realism) 和「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 的名稱首次為作者所採用，侵略現實主義後為一般改稱為「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見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基本上，守勢現實主義接受新現實主義的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以及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的運作與行為，但是卻有不同強調重點：守勢現實主義承認國家間存在安全困境的難局，以及權力是國家對外行動基礎，但是提出更具彈性與多重的主張；它同時引進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扮演的角色，亦即國際關係運作並非僅受權力分配影響，國家政策與行為也影響國際關係運作。

首先，守勢現實主義者接受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而且由於是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存在不確定性，國家必須尋求自保，但是當所有國家皆尋求自保，則產生安全困境的難局，此既是國際社會的特色，也是難以擺脫的難題。

然而，守勢現實主義者卻認為，安全困境是個難局，但並非不可解的難局；而且安全困境並不一定等於衝突與競爭，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間。守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安全困境下其實同時存在合作與競爭的選擇，現實主義者傳統上視合作具有風險性，殊不知競爭本身也具有高度風險性，而且一旦輸掉競爭，恐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不喜歡風險的國家不見得一定要選擇競爭，也可以選擇合作，而且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反能促使國家尋求合作，此可減低國家間的疑慮與不安全感。^⑤

其次，守勢現實主義者同意權力是國家安全的基礎與對外行動的依據，但是對於構成權力的內容卻有不同解釋。傳統上，不論是古典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皆把權力視為國家整體力量來看待，並未做特別的區分。守勢現實主義者以為此種作法並不周全，而且無法顧及權力與安全的明確關係。依照其主張，從國家軍事安全能力角度觀之，權力基礎可以區分為攻勢與守勢武力，亦即國家安全不是決定在空泛權力概念上，而是建立在具體的軍事任務與能力。^⑥譬如，一國是否擁有優勢的攻勢或守勢武力？兩者之間的資源分配比例為何？就成本效益言，何種資源分配最符合國家安全利益？一般來說，當守勢居於優勢時，一國須投注於國防安全資源相對較少，而且遭受外侵的可能也減少。然而，當攻勢居優勢時，一國須投注於國防資源相對增加，而且遭受外侵可能也增加。大體上，決定一國攻守優勢有若干重要因素，如軍事科技、軍力結構、地理位置、外交部署和政府能力等。^⑦換言之，守勢現實主義者強調，當把攻守能力納入考量後，可以修正過去權力分配決定國家安全的簡單化主張，讓權力與安全的關係更加清晰化，同時增加國家對外政策的選擇性。^⑧

註⑤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8~60.

註⑥ 軍事能力是否可以區分為攻勢和守勢能力？雖然多數守勢現實主義者接受兩者有時很難區分，而且其中的分野不易釐清，但他們幾乎都傾向兩者可以區分。有時為了謹慎起見，會在論述主張之前，特別加上假如兩者可以區分的前提。見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bid.*

註⑦ 以軍事科技言，步兵有利防禦，騎兵有利攻擊；城堡有利防守，火炮有利攻擊；機槍有利防守，裝甲車有利攻擊；核彈有利防守，飛彈有利攻擊等。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bid.*, pp. 16~22; and Kei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71~104.

註⑧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bid.*, pp. 62~63.

復次，守勢現實主義者並指出增加權力不等於增加國家安全，兩者並非等號。傳統現實主義者都接受權力既是國家的目標也是手段，但是守勢現實主義者卻以為安全是國家目標，權力只是手段，不斷追逐與擴張相對權力，可能不但無助於國家安全，反而造成安全危機。因為，此將會提高周邊國家警覺，加深安全困境的效應，而且擴張權力會迫使其它國家進行同等級對抗，包括軍備競賽與軍事結盟，最終還可能成為權力競逐的輸家。更甚者，如果不知區別攻守能力涵義，只是一味的增加相對權力比例，而非攸關該國安全的攻勢或防禦能力，此不但錯置國家資源與力氣，還可能傳送出錯誤的訊息，反而陷該國安全於危機當中。^③

再復次，守勢現實主義者提出「威脅平衡」(Balance-of-Threat)代替「權力平衡」的主張。以為國際權力分配並非構成國家安全威脅最重要的原因，威脅實際上來自於具體明確的標的，這些包括威脅對象、整體權力、地理位置、攻勢能力以及侵略意圖。國家通常是對特定國際威脅採取制衡的回應，而非一般國際權力分配。根據Stephen M. Walt的研究顯示，外來威脅是促成國際聯盟最重要的原因，而意識形態、經濟誘因或政治考量皆不具重要影響作用。^④

因此，安全困境並非不可以解，實際上存在彈性變化空間，而且在相同的國際權力結構下，國家存在許多選項，它可以如攻勢現實主義所說的不斷擴張權力，但也可以只強化一國的守勢武力，不對其它國家構成威脅，或甚至採取合作途徑，與相關國家進行軍備控制或裁減。通常，當守勢居優勢時，軍控變得不甚重要，一國僅須強化防禦武力就能保障安全，即使對手國家發展攻勢武力，亦不足以構成安全威脅，此會促使對方也轉向發展防禦武力，雙方權力競爭自然趨向緩和。當攻勢居優勢時，軍控就變得非常重要，如果能達成協議，尤其是限制攻勢武力的部份，則可以緩和軍備競賽，並有助現狀維持，但由於攻勢居於優勢，雙方為利益考慮，容易傾向欺敵隱瞞作法，此結果是軍控不但不易達成，而且容易遭到破壞。所以，守勢現實主義者強調在放入攻守變數後，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沒有改變，但是卻帶來較為豐富涵義與變化，國際權力競爭非國家唯一的選項，而是具有多重選項。^⑤

所以，守勢現實主義者指出，雖然國際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是扮演獨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的角色，但是國家政策則可以作為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的角色，在同一的國際權力結構下，個別國家採取不同的政策與策略，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⑥有些國家是屬於滿足現狀國家，有些則屬於不滿現狀：滿足現狀者可能傾向維持權力平衡政策，而不滿足現狀者可能傾向趨附勢力(Bandwagoning)

註^③ Ibid., pp. 70~72; and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bid., pp. 186~190.

註^④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208~248.

註^⑤ Glaser, Ibid., p. 67.

註^⑥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37.

政策。^③有些國家會關切權力平衡，但更多國家關切威脅平衡，亦即只有面臨到明確威脅時，才會從事制衡行動，而非為權力平衡而制衡。^④還有，如前述所提，國家可採取各種不同的攻守策略，此皆會產生不同結果。

此外，守勢現實主義者還強調，在某些條件下，國家意圖是可以溝通的。雖然國際社會不乏意圖擴張的國家，他們可能會採欺敵隱瞞策略，以便鬆弛國際戒心，而從中獲取利益，但是有些策略絕不是該些國家可以採行，因為要付出高昂代價，只有真正有意維護現狀和追求自身安全的國家才可能會採行。根據守勢現實主義說法，至少有三個政策可以傳達一國純然追求安全的意圖。第一個是軍控協議，如果軍力可以區分攻守之別，而且是攻勢居優勢，若能達成攻勢武力的軍控，則別具重要意義。但如果軍力無法區分攻守，若能達成裁減軍力規模，亦具有同樣意義。第二個是採取守勢策略，尤其當攻勢居優勢時，一國或雙方都願謹守守勢策略，此可傳達相當明確的訊息。第三個則是自我克制，一國有意減少自我防衛所需的軍力，如此作法具有風險，但能有效表達改善關係和維護現狀的善意，非意圖擴張國家能夠採行。換言之，國家可以透過合作或非威脅性策略，相互溝通彼此意圖。^⑤

最後，守勢現實主義者表示他們從未否認國家擴權現象，也未排斥國家為追求安全而採擴張政策。不過，他們皆強調只有在某些條件下，國家才會傾向擴張行動，例如，當攻勢居優勢時，易於征服，先發行動有高度勝算，可獲取豐富的戰利品，以及國際反彈行動甚為有限等。^⑥同樣的，國家為安全而採取擴張，亦有其條件因素，如存在安全威脅，擴張是減少威脅的有效策略，以及國家具有擴張的能力條件等。^⑦易言之，國家不會為擴張而擴張，否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且不論是擴張還是維持現狀都存在不同條件，不是屬於無條件狀態。更進一步言，縱然在有利於擴張的條件下，擴張也非必然，仍然有可能採取緩和措施，減少擴張的發生。

總而言之，守勢現實主義是權力政治的條件論者，而且因為是條件論，對國際社會抱持較為樂觀態度，權力鬥爭非國際社會必然的現象，存在著轉圜和合作空間。雖然國際權力結構對國際關係運作有重大約制作用，但是國家政策行動可以緩和或甚至改變國際行為，讓國際關係有更多選擇和多樣化面貌。此外，增權擴張並非確保國家安全的有效方法，相對的在某些條件下，守勢策略可能更為有效。守勢現實主義者以為他們的觀點合乎現實主義一貫的權力政治主張，還增加對國際關係現實的解釋能力，不只能適用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同時亦能適用至後冷戰時期。

註③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註④ Walt, *Ibid.*

註⑤ Glaser, *Ibid.*, pp. 67~70.

註⑥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and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 6.

伍、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評析

以上兩節把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作重點陳述，從此說明中可以明瞭兩者之間的差距，攻勢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擴權與權力競爭，守勢則關切國家安全與國際合作；攻勢現實主義重視權力分配與國際結構，守勢則著重國家政策與環境條件。無疑的，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只造成雙方理論觀點爭辯，而且影響實際政策主張。

接下來，擬進一步對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的差異進行分析，文中將就其中主要的三項爭議提出討論，亦即安全與權力、合作與競爭，以及國家政策與國際結構，文中將強調雖然兩者存在相當差異，但因同屬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兩者之間差別屬於程度之差，而非種類之別，亦即不同於其它國際關係理論間的爭辯，常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很難進行有效溝通，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則是使用同一理論的語彙與思維，此種內部型理論觀點的辯論，較容易產生溝通作用，而且通常還能對理論發展發揮建設性效果。實際上，從現有的爭辯內容來看，兩派觀點主張各有其長短處，而且雙方間具有互補功能，如果能截長補短，將更可增添現實主義理論效能。

首先，有關安全與權力孰是孰非的問題。守勢現實主義被批評最多地方是該理論乃屬維持現狀的主張，僅能反映片面國際關係的現象，而且無法有效解釋國際衝突發生的原因。^④守勢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在無政府狀態首要關切的是國家安全，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將極力維護現狀與國際相對權力的地位，他國的擴權行動必會受到相對國家的權力對抗與反制，如果不能自我約束將會遭受懲罰，國家安全不但無法自保，甚至面臨失敗或亡國的危機。然而，攻勢現實主義表示國際社會並非只是滿足現狀的國家，還有不滿足現狀國家，關於此點守勢現實主義者其實也承認該點，這些不滿現狀國家會試圖改變或推翻現狀，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和策略來進行擴權。他們並表示國際成員並非僅是從事權力制衡的活動，其實更多國家是趨附勢力，他們會審時觀勢，趨附於強權勢力，因為前者只是保有自我、避免損失，而後者卻可以擴大自我、增加利益，或至少是有機可乘、有利可圖。^⑤

守勢現實主義表示他們並未否認國際權力擴張現象，但這並非是無條件假設，而是在有條件之下。國際關係當中不乏因國內政治因素和決策者認知發生偏差，而極力向外尋求擴張的國家，如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但通常都以失敗收場，付出慘痛的代價。^⑥而且守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國際關係存在社會化學習，國家為了生存會自然向成功的模範學習，如何適存於國際社會中，漸進發展形成國際行為準則，從中認知

註④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170~171.

註⑤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0; and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pp. 85~88.

註⑥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pp. 72~107.

註⑦ Snyder, *Myth of Empire*, Ibid.

擴張並非保障國家安全的適當途徑。^⑤然而，攻勢現實主義者以為國家不會是現狀支持者，因為國家無法知道要如何維持現狀，國際現狀很難維持，也非國家能掌控，國家只能增加自我的權力。雖然國際關係不乏失敗案例，但也有很多成功案例，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知道行動的結果。更甚者，攻勢現實主義將所有國家視為一體來看待，從未區分何者是野心擴張國家或愛好和平國家，國家只要有其能力和有機可乘都會尋求擴張。再說，雖然國家會模仿權力制衡或守勢防衛，但是國家也會模仿權力擴張或攻勢出擊，而且國家不只會模仿還會創新，會尋求新的策略超越對方，或發展新式武器和新戰略戰術。^⑥

無論如何，雖然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各有說詞，但是實質而言，不論從理論還是現實觀之，安全與擴權的界限相當模糊，兩者存在灰色重疊地帶，很難加以釐清，縱使如守勢現實主義主要源流出處的代表性學者 Waltz，他都曾表示國家既是追求安全也是擴張權力。^⑦而且前文曾提及守勢現實主義者並未否定國家增加權力的需求，也未否認國際擴權現象，只是強調擴權並非是有助國家安全唯一方法，而且盲目擴權反而是有害，亦即在國家安全目標下，要如何擴權、程度多少，以及何種方法等，是他們關切的重點，他們把擴權視為工具和策略。另外，攻勢現實主義者亦沒有否認現狀，只是認為現狀很難維持，沒有一個國家會把維持現狀作為目標，因為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同時攻勢現實主義者也從未表示國家會不顧一切擴張，前文中曾說明過，是否擴張會經過審慎理性的評估，謀定而後動，這當中有許多戰略和策略考量。因是之故，根據上述，可以很清楚認知，兩者其實都接受國家追求安全與擴權的現象，也都同意擴權的策略考量，兩者之間存在程度差別，而非種類相異。

其次，有關合作與競爭的爭議。此部份可能是守勢現實主義最精彩但也最具爭議的地方，守勢現實主義打破傳統現實主義所持國際關係乃權力競爭的基調，以為國際社會存在安全合作空間；它挑戰攻勢現實主義所持國家意圖無法知悉的主張，認為國家間意圖是可以相互溝通；它並跨越新現實主義所持權力結構與外交政策的界限，把外交政策的因素與作用引進權力運作範圍。

守勢現實主義的國際安全合作主張，如果能成立，無疑是現實主義理論一大突破，但是很明顯的該主張和傳統現實主義立場並不一致，現實主義向來秉持國際衝突本質的觀點，權力關係屬於相互競爭，縱然國家間有時也會合作，但是此乃利益權宜考量，而且很難持久。相對的，守勢現實主義合作主張比較類似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亦即國家之間同時存在衝突與利益的關係，如果屬於衝突關係，則合作不會發生，但如果具有共同利益，則可以促成合作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倡透過制度功能促進合作可能，而守勢現實主義則是主張經由國家政策的行使促進合作。^⑧換言之，他們兩者

註⑤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7~128.

註⑥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166~167.

註⑦ Waltz, *Ibid.*, pp. 117~118.

註⑧ 可參閱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and 鄭端耀, 「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第 36 卷, 第 12 期 (民國 86 年 12 月), 頁 1~22。

都接受國際合作可能，但是對促進合作手段卻有不同主張。守勢現實主義者甚至認為，在其倡導的主張之下，不但可以實現國際合作，而且可以糾正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制度促進合作的不必要與不適當的方法。^⑤

守勢現實主義對國家意圖可以溝通的主張，與攻勢現實主義觀點相反，也與傳統現實主義對國家看法有別。傳統現實主義視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相同角色，追求相同目標，國家間只有利益衝突問題，而沒有敵友關係。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可以存在敵友關係，亦即權力擴張者（敵）與安全維護者（友）的關係，兩者之間敵友關係並非既定的，而是透過相互的互動，政策訊息的傳達，與意圖的溝通，此所謂國際社會化的過程所建構形成的。這些觀點顯然的非屬現實主義，較類似社會建構主義主張，而且從這裡可以看到，在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發展的過程中，無疑受到了風行於後冷戰時期的建構主義影響，強調關係的互動性與建構性。^⑥不過，守勢現實主義並未接受建構主義有關理念與認同概念的影響，仍然是以權力作為國家行動基礎，以利益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依據。

無疑的，守勢現實主義的國際合作主張，透露若干理論上的創新與突破，並凸顯他們有意克服現實主義世界無法合作的迷思。然而，如前文所提及的，守勢現實主義有關合作的主張，全是依賴外來理論的概念，此與傳統上的現實主義是不相符合的，甚至就某些程度而言，已經偏離前文所列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而這也是守勢現實主義受最多批評之處。在此，守勢現實主義者為了淡化該方面弱點，特別強調外交政策的角色與作用，以外交政策來維繫與現實主義的根本關係。

最後，有關外交政策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前述所提守勢現實主義有關合作與溝通的主張，這其中仍需要中間傳達的媒介工具，而此工具正是外交政策。顯然的，守勢現實主義是有意提升外交政策層次的重要性，讓這些原本被新現實主義或攻勢現實主義視為次要或不重要因素，屬於外交政策範圍的東西，能夠重新被國際關係領域重視，縱使不能扮演和國際體系同等的重要性，但至少具有中介作用，不應當被忽視。

雖然目前尚無法得知外交政策到底能發揮多少影響力，此恐需要透過相當時間的經驗研究探索，但不容否認的，守勢現實主義對外交政策角色的主張，當有助現實主義理論跨越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層次的界線，並能讓兩者發揮互補效用，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觀可以提供遠距離概括圖形，國家層次的外交政策分析內容，如安全戰略、武器科技、地緣因素、外交目標與互動關係等，則可以呈現近距離實物描繪；權力結構觀可以充作中長程國家發展評估指標，外交政策分析則可作為短程策略評估依據。反面而言，僅有權力結構觀無法窺視到國際關係的變化性與豐富性，只有政策分析無法在這眾多紛亂的國際關係現象中理出一個方向。所以，若能夠適當結合兩者的優點，

註⑤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bid., pp. 83~85.

註⑥ 可參閱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鄭端耀,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 秦亞青, 「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 袁易, 「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之批判」; 和石之瑜, 「做為藝術的政治學」, *美歐季刊*, 第 15 卷, 第 2 期 (民國 90 年夏季號), 頁 199~309。

確實能讓現實主義理論發揮更大解釋與預測能力。一個理想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可以先從權力結構的假設來探討國際行為模式，接著再從一國外交政策內容與實行狀況細究實際國際行為，然後透過相互比較分析尋求答案，這樣的兩層次分析法應該可得到較完整的面貌。

無論如何，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建構，無可避免的遭致許多批評，例如，國家安全概念不清礎，理論架構不嚴謹，理論主張過於混雜，缺乏應有的特殊性與純淨度，以及太多假設條件，卻缺乏實現可能性等。^②攻勢現實主義正如前文曾經提及的也遭受多處的批評，例如，過於簡單化，一廂情願臆測，決策黑箱作業，無益於事實瞭解等。顯然的，如果稍為對照兩者缺失，會輕易的看到，一方的缺點正是另一方的優點，兩者確實呈現多方面的互補效應。毋庸置疑，理論建構本身存在許多抉擇，嚴謹還是包容，特殊抑或豐富，通常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兩者是很難兼顧的，而現實主義透過內部攻勢與守勢兩學派的理論辯論，從而建構不同主張但卻能互補不足的結果，堪稱是該辯論相當正面與健康的發展。

陸、結 論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於後冷戰時期面臨嚴竣挑戰，國際環境持續緩和致使現實主義理論受到質疑，而現實主義內部又遭逢理論爭辯，產生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兩個學派，前者承續新現實主義權力結構論，並結合古典現實主義權力鬥爭主張，形成極具侵略性的攻勢現實主義面貌，而後者雖也秉持新現實主義權力結構論，但同時揉合外交安全策略主張，以及部份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概念，形成較具溫合與包容色彩的守勢現實主義面貌。由於兩者對無政府狀態性質、權力作用，以及外交政策有不同的詮釋與強調重點，他們對於國家安全、國際合作、權力結構影響力，以及政策角色皆有不同的觀點。

雖然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有許多差異，誠如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只是程度之差，而非種類之別。畢竟兩者有其共同脈絡，有著共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彼此沒有否定對方，只是對國際關係現象有不同解釋偏向，而這些不同觀點實際上還具有互補作用，對現實主義發展能產生正面助益。此結果也證明相同脈絡下的學派辯論，較易形成交集而導致建設性的對話，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辯論，^③而不同脈絡的學派爭辯，則容易形成各吹其調，缺乏有意義的對話與實效，如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辯論。^④

註② Legro &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bid., pp. 5~55.

註③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④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1989), pp. 235~254;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此外，本研究的結果亦顯示，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建構發展，不論對理論研究與實務政策的取向皆增添若干探索與選擇的空間。以研究取向言，其一、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可進一步擴大經驗應證的研究，目前兩者的經驗研究尚相當有限，還有廣闊空間有待開發，而且透過實際經驗探討，可藉此檢驗該理論的可信度與適用範圍。其二、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可以相互結合，建構成兩層次分析的研究途徑，讓兩者的優點做最有效的發揮，並以此探索國際權力結構與外交政策的互動關係。其三、攻守勢現實主義只觸及到國際與國家政策層面，並未論及國內政治與決策者層次，但是後者的重要性其實亦不該被忽視。近年來，被外界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已展開這方面研究工作，本文雖未能討論到該學派的理論主張，但是從整體研究發展取向論，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可更進一步與該學派研究相結合。

以實務政策取向言，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提供兩個不同的政策思維觀，任何其中之一的政策選擇，都會對國際關係世局形成深遠重要的影響，而且如果兩者是對立的抉擇，恐會增加風險的負擔，但如果把此兩者結合排列形成政策連續光譜看待，政策選擇會變得較為寬廣與富有彈性變化。實際上，在國際現實環境中，攻勢或守勢政策行為經常展現流動狀態，或者是相互交錯運用。因此，如能夠將兩者併同考慮，甚至能研析攻勢轉向守勢或相反方向的條件與環境，將更有助於政策取向的考量。

最後，本研究結果亦證明現實主義理論的韌性與生命力。該理論屹立於國際關係理論達半個世紀之久，雖然在後冷戰時期曾面臨外在環境變遷與內部理論爭辯的雙重考驗，但時至今日的發展似乎顯示，現實主義已度過較困難階段，至少在理論爭辯的部份，不但未形成內部分裂，而且還將有益於理論建構與成長。換言之，現實主義今日已非單一理論，而變成家族式的理論族群，在這個家族中，各支系發展出自我的特色與主張，但仍維持共同的根基與脈絡，只要各支系理論不至於過度的推演發展，整個現實主義理論應還有成長空間。

* * *

(收件：91年8月22日，修正：91年11月26日，接受：91年11月29日)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Defensive vs. Offensive Realism

Tuan Y. Che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alism has been seriously challenge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long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undermined it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 theory, due to its internal theoretical disputes,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 of thought – defensive realism and offensive realism. The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narchy, the natur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ole of the policy maker; they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on various issues reg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the two school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ir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only exist in degree but not in kind. Each approach has its theoretical applicability and limit, and in fact the two approaches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a broader framework and generate more explanatory power since they are complementary in many aspects. Moreover, as long as the debat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realism will not be over-extended beyond the theoretical bounds of realism, it should prove posi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realism as a whole.

Keywords: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參考文獻

- 鄭端耀 (2001),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之評析」; 秦亞青, 「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 袁易, 「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之批判」; 和石之瑜, 「做為藝術的政治學」, 《美歐季刊》, 15, 199-309。
- 鄭端耀 (1997), 「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36, 12, 1-22。
- Baldwin, D. A.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M. E., S. M. Lynn-Jones, and Miller, S. E. (1995), *The Perils of Anarch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arr, E. H. (1964),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 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Doyle, M. W. and G. J. Ikenberry, (1997),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Evera, S. V. (1999), *Causes of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vera, S. V. (1998),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5-43.
- Glaser, C. L. and C. Kaufmann, (1998),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44-82.
- Glaser, C. L. (1994/95),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50-90.
- Hopf, T. (1991),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in Military Techn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475-494.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167-214.
- Keohane, R.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Keohane, R.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376-396.
- Keohane, R. and J.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Labs, E. J. (1997), "Beyond Victory," *Security Studies*, 6, 1-49.
- Lapid, Y. (1989),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235-254.
- Legro, J. W. and A.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5-55.

- Levy, J. S. (1984),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in Military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 219-238.
- Lieber, K. A. (2000),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71-104.
- Lynn-Jones, S. M. (1998),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57-182.
- Lynn-Jones, S. M. (1995),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660-691.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 Mearsheimer, J.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49.
- Mearsheimer, J.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5-56.
- Mearsheimer, J. J.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266, 35-50.
- Morgenthau, H.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 Y.: Alfred A. Knopf.
-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44-172.
- Sagan, S. D. (1986),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1, 151-176.
-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72-109.
- Smith, S., K. Booth, and M. Zalewski,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 (1991), *Myths of Empi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 W. (200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28-161.
- Walt, S.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208-248.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